

曹应旺 著

高端协力中的

内卷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人民出版社

曹应旺 著

GAODUAN
XIELI ZHONG DE
ZHOU ENLAI

高端协力中的

周恩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端协力中的周恩来 / 曹应旺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20-07538-4

I. 高… II. 曹… III. 周恩来 (1898~1976) 一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8398 号

GAODUAN XIELI ZHONG DE ZHOUENLAI

高端协力中的周恩来

曹应旺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李洪烈
文小牛
戴雨虹
叶 勇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mm×235mm

印 张

17.7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7538-4

定 价

3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录

第一篇 周恩来和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的40多年中，周恩来处处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常常有意识地让毛泽东扮演决策者的角色，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而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具体进入实际操作之中。

□ 协力、同心、共命

- 一、协力 / 2
- 二、同心 / 6
- 三、共命 / 9

□ 周恩来与毛泽东诗词

- 一、“‘长夜难明赤县天’并非‘赤悬天’” / 13
- 二、“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 16
- 三、“无限风光在险峰” / 19
- 四、“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 22

□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 一、周恩来与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 / 28
- 二、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宣传、阐释和发挥 / 35
- 三、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坚持、补充和发展 / 38

□ 毛泽东在外交上对周恩来的倚重

- 一、毛泽东倚重周恩来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外交方面 / 45
- 二、建国前在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已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 48

- 三、周恩来在签订中苏新约和出席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 / 50
- 四、“文革”动乱中周恩来的外交工作 / 53

□ 毛泽东、周恩来与三峡工程

- 一、远大的理想 / 55
- 二、历史的脚印 / 60
- 三、民主化典范 / 66
- 四、“她在丛中笑” / 71

□ 毛泽东、周恩来与南水北调

- 一、北方缺水 / 76
- 二、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 / 77
- 三、设想中南水北调的线路 / 80
- 四、周恩来过问南水北调 / 82
- 五、由理想到现实 / 83

第(二)篇 周恩来和邓小平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 兄弟和战友

- 一、“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 86
- 二、在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岗位上 / 87
- 三、患难见深情 / 89

□ 邓小平心中的周恩来和他的外交

- 一、伟大的交接 / 92
- 二、邓小平心中的周恩来 / 93



目录

三、珍惜周恩来外交遗产 / 95

□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1973

- 一、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的提议 / 101
- 二、周恩来心目中“下放劳动”的邓小平 / 102
- 三、“九一三”之后围绕邓小平复出的斗争 / 105
- 四、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 110

□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1974

- 一、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 113
- 二、周恩来努力促成邓小平出席联大 / 115
- 三、江青攻击周恩来企图抓“组阁”大权 / 118
- 四、王洪文赴长沙告状 / 121
- 五、305医院门前车水马龙 / 124
- 六、“长沙决策” / 126

□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1975

- 一、周恩来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 130
- 二、邓小平开始领导全面整顿 / 133
- 三、“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批“经验主义” / 136
- 四、全面整顿使各方面工作出现明显好转 / 140
- 五、“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 142

第三篇 周恩来和陈云

中南海西花厅是周恩来总理办公的地方。与西花厅相对应的东花厅曾经是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办公室。就像西花厅与东花厅的建筑互为犄角之势一样，在经济运筹中周恩来和陈云一直是一对好搭档。

□ 经济运筹中的好搭档

- 一、在“三大战役”中 / 148
- 二、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 155
- 三、反冒进的两位主将 / 163
- 四、国难思良将 / 178
- 五、在七千人大会前的经济调整中 / 180
- 六、在七千人大会后的经济调整中 / 184
- 七、经济调整的思想基础 / 189
-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 / 194

第 四 篇 周恩来和陈毅、郭沫若

林彪、江青指使一伙人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揪斗陈毅。周恩来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 “看我公樽挫折强权”

——周恩来和陈毅

- 一、周恩来喜爱陈毅诗词 / 201
- 二、陈毅诗送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跟随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 204
- 三、陈毅担任外长后，同周恩来密切配合的外交诗篇 / 206
- 四、兄弟之情，如手如足 / 212

1966年8月30日，在周恩来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郭沫若居宋庆龄之后，位列第二。这年冬，国内动乱在升级，周恩来请郭沫若、于立群暂时离开家到外面去住，并叮嘱这件事不要告诉机关，只带秘书和司机，以防泄密。

□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周恩来和郭沫若



目录

- 一、一副悼父赞子联 / 214
- 二、同引曹植《七步诗》 / 217
- 三、文艺创作、历史研究的知音 / 219
- 四、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 222

第五篇 周恩来和著名科学家、水利专家

在中国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的发展过程中，钱三强、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与他们的交往是大政治家与大科学家的心灵相通。

□ “地质工作要当先行”

——周恩来和李四光

- 一、期待李四光回国 / 228
- 二、登门拜访，委以重任 / 230
- 三、关心李四光的身体健康和政治生命 / 232
- 四、开发铀矿资源 / 234
- 五、石油勘探放异彩 / 235
- 六、投入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工作中 / 236

□ 原子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协力

——周恩来和钱三强

- 一、在西柏坡支持钱三强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 / 239
- 二、从组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到成立原子能研究所 / 241
- 三、发展原子能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人才 / 243

□ 导弹航天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协力

——周恩来和钱学森

- 一、钱学森回国是周恩来外交努力的结果 / 247
- 二、周恩来交给钱学森写个意见书的任务 / 249

三、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 / 250

四、任命钱学森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 251

五、“文革”期间，周恩来对钱学森的特殊保护 / 253

□ 大任系安危，功勋泽人间

——周恩来和邓稼先

一、周恩来逝世，邓稼先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 255

二、大政治家与大科学家的心灵互通 / 258

三、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一样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260

周恩来不仅在长江、黄河、密云水库、岳城水库、新安江水库等现场亲自向张含英、钱正英等水利专家询问治水规划、工程设计与施工进度情况，不仅亲临现场支持水利专家们的工作，帮助解决水利专家们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常常把他们请到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商讨治水大计。

□ 像大禹治水那样为中华民族谋取福利

——周恩来和水利专家

一、重视水利科学与水利教育 / 263

二、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 /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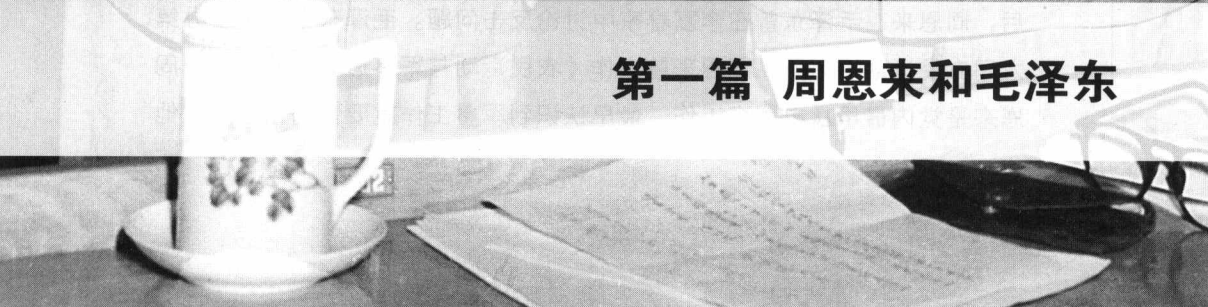
三、为水利专家铺垫道路 / 268

四、严格的要求，真诚的批评 / 271

五、于危难中见真情 / 274



第一篇 周恩来和毛泽东



协力、同心、共命

周恩来与毛泽东开始来往于北伐战争时期的广州，此后他们共事达50年。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正如郭沫若在《怀念周总理》的词中所写：“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

一、协 力

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协作共事在北伐战争时期的广州就开始了。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三期刊登的《东征纪略》，曾对第二次东征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工作作过评价和介绍。其中写道：“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当时，毛泽东曾到黄埔军校演讲。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杨振宁时，杨问：“周总理，您什么时候认识毛主席的？”周恩来说：“1925年认识的，1931年以后就同主席在一起工作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毛泽东曾在李富春家中讨论反击问题。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曾去作《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的讲演。周恩来是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最早认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他



在黄埔军校创立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及重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对后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影响。1937年10月，毛泽东总结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军队工作方面的经验时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为一个军，影响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领导九九秋收起义，相继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毛泽东、周恩来同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红军第四军。在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向贺龙等介绍了朱毛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存在着分歧，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红四军面临着危机。8月21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朱毛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甚大，保存这部分实力更扩大之，便是对全国的政治影响的保存与扩大，热烈的精神，更应集中力量向着敌人。根据中央的指示，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并决定周恩来、陈毅、李立三组成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处置领导内部分歧问题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并明确提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仍应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陈毅按照周恩来谈话精神，

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这年底，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召开的红四军古田会议，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的新的前委。红四军不仅胜利渡过了危机，并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朱德一起领导反“围剿”斗争。由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1932年10月宁都会议错误地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与斗争。尽管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但会议还是削了毛泽东的兵权。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长征路上周恩来最突出的贡献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遵义会议情况时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后的40多年中，周恩来处处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常常有意识地让毛泽东扮演决策者的角色，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而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具体进入实际操作之中。

抗日战争中，基本上是毛泽东主于内，周恩来主于外。周恩来不仅在处理西安事变，在五次谈判中屡建大功，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核心——武汉、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发展了统一战线，发展了党的组织，推进了战争动员，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开展了工农运动，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成绩显著。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并具体指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策划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在恐慌气氛笼罩下的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毛泽东称赞。



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先是转战陕北，后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出色地发挥了将原则具体化、战略步骤化的作用。当毛泽东、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已是决策的中心，周恩来已是办事的中心。

建国初，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他多次同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

中国古代的哲人老子曾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还有一位哲人晏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周恩来与毛泽东处事中的协力，是和而不同的协力，是差异互补的协力。这种协力的效果，不是按算术级



转战陕北前夕，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在一起。

数增加的，而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

二、同心

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由衷地维护毛泽东在国家和意识形态领域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毛泽东怎样信任他，无论他在党内的威信有多高，从不居功自傲，从无个人野心。即使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甚至不公正对待，他也从无私心，总是寻求共同点，维护团结的大局，多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信任周恩来，许多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去办。

建国前，毛泽东就想过周恩来是未来新中国总理的最佳人选。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就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还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总理”分别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代名词。周恩来维护“主席”，毛泽东信任“总理”。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亲切地称呼“主席”。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有时在书信中称呼“周总理”，有时则信任而又尊重地称呼“总理”。毛泽东与他人交往中，直接而简便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少见的。“周”和“总理”这两种称呼方式，毛泽东只对周恩来使用过。这从一个细小的侧面反映着毛、周关系：信赖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亲近。

由于周恩来处于辅佐毛泽东、总理国务的位置上，加上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党内外名人学者喜欢将他比之为西周时的大政治家周公旦，尊称为“周公”。并常常这样称颂周恩来：“周到，周到，周公一到，一切周到。”毛泽东也曾用“周公”尊称周恩来。1949年12月2日，毛致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



吐握之劳。”无论这是毛的评价还是毛同意别人的评价，都体现了毛对周信任及对其政绩的肯定。

功越高而心益下，名越尊而行益谦。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信任和赞扬面前，始终如此。

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数不清的单独会面中，凡是周恩来提出、被毛泽东采纳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公开传达时总说是毛泽东的决定。

在历次公开的重大活动中，周恩来总是突出毛泽东的形象，把聚光灯的焦点对准毛泽东。1956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西郊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上百名摄影记者涌上前去。一位同志为了抢拍毛主席的照片，不顾一切地把长镜头往前一伸，竟从前面一位同志的肩上伸了出去，并以此为依托进行拍摄。前面这位同志一动不动地挺立着，直到拍完。当记者收取长镜头，前面的同志回过头时，记者才大吃一惊：“啊！总理！”这只是周恩来在许许多多外事活动、社交场合把聚光灯焦点对准毛泽东的一个细小的例子。

即使在毛泽东不在场而只有周恩来出席的活动中，周恩来也毫无例外地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冒着余震的危险，亲临灾区视察，他每到一处总要说：“主席让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灾民的心上。

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延边，在宾馆前接见各族群众时，群情激动，欢腾雀跃。周恩来身旁的一位同志脱口说：“各族人民群众是多么热爱总理啊！”周恩来立即纠正道：“这是毛主席的威望，党的威望。”

“文化大革命”中，局势越是复杂、动荡，毛泽东越是感到周恩来处理危机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特殊作用。周恩来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精神，忍辱负重，忘我工作，尽可能地减轻动乱造成的破坏。邓小平同志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

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文革”动乱，如果周恩来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其后果将不堪想象。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曾一度病危。周恩来全力组织医务人员进行抢救，使毛泽东病情得以好转。此时此刻，周恩来在苦撑危局中仍然说，请主席放心，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也许，毛泽东有感于司马迁为汲黯、郑庄列传所写的那段人际关系评语。也许，汲黯对汉武帝说的“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这句话震撼了毛泽东的心。也许，毛泽东赞赏汲黯不谋权位、无意升迁、忠心为国的高尚品德。也许……毛泽东把周恩来比作汲黯，并要他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为此，1973年3月26日5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他总是这样谦虚居下。事实上，周恩来“忠诚与日同辉耀”，“盛德在民长不没”，何止于历史上的汲黯！

周与毛之间一直没有过正面的尖锐冲突，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在对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上，他们是根本一致的。但是，“谋事”与“成事”、务虚与务实、战略目标考虑问题与战术步骤考虑问题，有时也会出现差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即反冒进问题上，毛、周之间有过分歧。从1953年到1957年，特别是1956年，周恩来多次批评急躁冒进。他认为热火朝天当然很好，但要小心谨慎，领导者头脑热了的要用冷水洗洗。1958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召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周恩来对毛泽东措辞尖锐的批评尽管有想不通的地方，但总是接受的。他在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批评反冒进带来了“大跃进”。“大跃进”的主观蛮干，带来了国民经济失调、生产力破坏、人民生活困难的严重后果，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调整。实践证明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然而，在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多次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检讨大办钢铁的错